



□ 罗建波

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历史意义

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，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近70年来，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、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、和平共处”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，也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，成为规范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。

这五项原则最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。1954年4月29日，中印两国签署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》，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协定中，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。双方同意，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以和平方式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在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等原则基础上增进双边关系。同年6月，周恩来先后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，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了联合声明，声明中都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此后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，逐步得到世界上的广泛认可。

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，是新中国国家身份和外交政策选择的必然要求。1949年9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，规定了处理对外事务的政策和基本原则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、自由的国家和人民，首先是联合苏联、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，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，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

略，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。”新中国明确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，同时也认为自己属于被压迫民族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一员，把加强同广大民族独立国家的团结合作视为自身重要的外交选择。

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，也是缓解新中国外交压力的现实需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一些国家怀着意识形态偏见诋毁中国的政治制度，曲解中国的外交政策，对中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中国及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就是要告诉世界，虽然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存在一些差异，在具体外交政策上存在一些不同，但中国愿意超越这些差异和分歧，在相互尊重、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，实现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。1954年6月，周恩来总理在印度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指出：“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，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，是可以和平共处的。”随后中印总理联合声明强调，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它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，而且也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中。

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并推动会议取得巨大成功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成功运用。在1955年4月于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，面对部分与会代表对新中国内政外交的质疑，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“求同存异”的方针，提出愿意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开展团结合作。亚非会议发表了著名的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》，提出10项处理国际关系原

则，实际上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。中国的真诚态度有力维系了亚非会议的团结，推动会议达成了以“团结、友谊、合作”为核心的万隆精神，同时中国也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广泛理解和支持，新中国的外交舞台开始拓展到更广阔的世界。

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精髓，在于它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完全平等，以及内在表达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实现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。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，任何国家都不得无理干涉他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，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，都应当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，都应当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可能争端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，这些主张尤其具有强大吸引力。因为在近代历史上，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侵略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，对痛苦的外来侵略和殖民压迫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，对主权平等和互不侵犯有着强烈的渴求，对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有着深切的渴望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，便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。

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达了中国的外交主张，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。在国际事务中，中国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，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立场，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，不干涉别国内政，不搞强加于人，也决不允许他人对中国的内政指手画脚。同时，中国

外交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重要追求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坚定不移地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、全球发展的贡献者、国际秩序的维护者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，推动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。正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这一总路线，中国坚定捍卫了自身的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，也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凝练出现代国际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，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和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。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基础，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是保障，平等互利、和平共处是目标，三者构成了内涵丰富、逻辑严密的国际关系准则体系。其本质，就是要反对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霸权主义、强权政治旧思维，以及倚强凌弱、以大欺小的老做法。其目的，就是要建立各国相互尊重、平等相待的国际交往新范式，建立公平正义、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适用于处理同周边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，随后发展为不同性质国家交往的普遍原则，成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准则，从而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世界影响力。



2022年7月8日星期五

STUDYTIMES

學習時報

07

(一)

鸦片战争后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有传教士、探险家、博物学家、商人、政客等，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热爱一项运动，那就是打猎。如果观察近代在中国的西方人，鲜有不爱打猎的，这和他们的狩猎传统有关。从中世纪到近代，狩猎是西欧和北欧宫廷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贵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。

其中，英国人热爱打猎是出了名的，流行于王公贵族群体，他们的狩猎爱好源自一项射鹿运动。在所有猎物中，鹿是最尊贵的。自1066年诺曼底公爵占领英国，射杀麋鹿便成为王室表明身份的重要活动。对于猎手而言，能在狩猎中射到一头雄鹿是无上的荣耀。如果猎到鹿的人是国王，那他便会兴奋得用手沾满鹿血，涂抹到亲近的贵族脸上，涂在脸上的血不能立刻擦洗掉，要等到自然脱落才行。

在17世纪之前的英国，狩猎只是国王的特权，猎物又被称为“国王的猎物”，其他人哪怕藏有捕野鸡的工具，也会被冠上蔑视王权的罪名。英国历代君主几乎都痴迷狩猎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尤其如此，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，却个个都是优秀的猎人，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打猎中。其中詹姆斯一世最夸张，爱好打猎胜过一切，一天能连续在马鞍上待6个小时，他与民间的交往也多限于仆人、猎人和守林人。最后他死在了一次狩猎途中。

直到《1671年狩猎法》出台后，王室和骑士以上成员才有资格在自家庄园和领地内拥有枪、猎狗、罗网等捕猎工具，狩猎遂成为整个贵族的文化。等到大型动物被射杀的差不多了，英国皇室又把目光转到了小型动物如狐狸身上，从19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一场声势浩荡的猎狐运动风靡全英国，捕猎也从国王专有，变成在旧贵族、新贵族以及部分富有的中等阶级内部流行。

西方人之所以迷恋狩猎，除了这项运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外，他们认为狩猎还是一种训练作战能力的手段。抓捕猎物的过程还体现了男性的力量，是训练男子汉气质的完美运动。

在海外殖民地进行捕猎活动的欧洲人，尤其带着征服者的姿态，被喻为当时最有男性气概和魅力的一群人，不少探险小说里都塑造了这样的主角。

(二)

近代来中国的不少西方人热衷猎捕大型动物。柯志仁是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，在《蓝虎》中，他记载了自己在福建捕虎的经历。柯志仁在美国接受过专业的狩猎训练，擅长射击，来到福建后他一面传教，一面在福建的山区打猎，并将猎获的动植物标本送往美国的自然博物馆。

射杀老虎等大型动物困难极大，不仅需要枪、助手、猎狗等，还要承担一定的生命风险。在所有的捕猎游戏中，最简单的莫过于在一些淤积的泥滩、河岸两侧的低地伏击野鸡、野鸭等禽鸟。近代长江流域，有数量奇多的野鸡、野鸭、鹌鹑、松鸡、竹鸡等猎禽，为了能更多地捕杀这些动物，有人还专门撰写了狩猎手册。在当时最出名的莫过于魏德的《提枪驾船至长江》，书中对猎物种类、猎枪的使用、房船的构造等都作了详细介绍，是猎手去长江流域捕猎的必备指南。

说起猎枪，以前人们狩猎主要靠刀箭这些冷兵器，能捕获到的猎物规模有限，但自从火枪成为欧洲主要狩猎工具后，一切都不同了。葡萄牙人首先把火枪带到了中国，明朝名将胡宗宪在他的《筹海图编》里，记载了葡萄牙人把鸟枪带到浙江双屿港的过程，用火枪狩猎加速了西人对中国生态的破坏。

到长江流域打猎，房船也是其中颇为重要的工具。房船类似现在的房车，是享受旅游打猎的高级奢侈品。和普通船只不太一样，房船里有休息室、卫生间、厨房等，能容纳十几人生活，是大规模捕猎时重要的交通和装载工具。1873年上海有房船80余



□ 李萝白

条，至20世纪初这个数字翻了1倍，因为当时射猎不再只是一项运动，还变成了商业行为。这些禽鸟一开始只是探险家们漫长路途上的辅助美味，随着近代海外市场需求的日益旺盛，它们遭到了狩猎者们不分场合和时间的围捕。

长江流域的雉鸡是猎手们最钟爱的目标。雉鸡别名也叫野鸡，是中国比较常见的一种野禽。亮丽的野鸡羽毛受到西方上流社会的追捧，阔太太们用羽毛做帽子、衣服和室内装饰品。另外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野鸡罐头味美、易保存，成为战场食物补给的重要来源，近代西方社会对野鸡的需求量与日俱增。与此同时，冷藏技术的提高又增加了野鸡肉的储存期限，为海上长途运输提供了可能性。19世纪下半叶，国际冷藏轮船运输出现了巨大的技术突破，在技术等准备都完备后，西方人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野鸡灭绝活动。

上海怡和洋行的猎手1人1天可以捕猎540只野鸡，还面向市场广泛收购。仅仅1899年的一个夏天，镇江的一个洋行就运了17000只野鸡的皮毛。1907年，和记洋行在汉口正式成立，开始只是收购皮毛，后来他们发现有大量野禽是因为失去羽毛而丧生，而伦敦就是最大的野禽消费市场之一，便开始大规模地收购禽鸟，冷冻后再运往伦敦。1909年，和记洋行仅运送野鸭就多达16万只，1913年，运送的野鸡更多达50万只，长江中下游的鸟类完全被和记洋行控制。

西方人的狩猎活动对中国生态造成了巨大破坏，许多地方曾经野鸡遍地跑，而短短几年后已鲜能看见。近代西方人在本国遵纪守法，来到中国却如同到了法外之地，人性的野蛮和残忍暴露无遗。被这种野蛮行径破坏的生态环境是全球人类共同的财富，近代西方人的“法外之地”心态更是对文明世界的毁坏，文明的构建极其困难，而破坏它却易如反掌。



(上接1版)

坚持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，持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。粮食安全的根基是“能力安全”，要切实把着力点放在国内生产能力、必要的储备能力以及国际资源掌控能力上来。一是藏粮于地。“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，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。”近18年来，我国粮食连年丰收，只有两个年度小幅减产，打破了以往“两增一减一平”的怪圈，主要得益于耕地等基础设施保障能力的不断增强。二是藏粮于技。“解决吃饭问题，根本出路在科技。”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，但产量却翻了一番多，主要靠提高单产。提高单产，主要靠良种、靠科技进步。三是增强粮食储备能力。国家逐步建立起粮食储备体系，管好用好“天下粮仓”，对于调节丰歉、平抑物价、保证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。四是不断深化粮农领域国际合作。在毫不放松国内生产的同时，积极利用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促进全球范围内粮食资源合理高效配置。

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、谷物基本自给的基础上，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。我国每年消费2亿多吨畜禽水产品、7亿多吨蔬菜，与6亿多吨粮食一样，都是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。“要树立大食物观，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，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，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，保障肉类、蔬菜、水果、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，缺了哪样也不行。”长期以来，我们坚持向森林要食物，大力发展木本粮油、森林食品；向草原要食物，积极推动草原畜牧业集约化发展；向

江河湖海要食物，稳定水产养殖，积极发展远洋渔业；向设施农业要食物，发展现代化设施种养业，探索智慧农业、植物工厂，有效缓解了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约束。

坚持完善政策体系，保护和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。一是保护农民积极性。关键是让农民种粮有钱挣，逐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，坚持和完善最低收购价制度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。二是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。聚焦良种良法，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农业科技人员创新举措，允许科研人员自主创业、持股兼职，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。三是压实地方责任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即建立粮食省长负责制，目前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。任何省市区，无论耕地多少，都要承担粮食生产责任。与此同时，不断加大对主产区的支持力度，调动主产区积极性。

全力以赴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”“要未雨绸缪，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”。当前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突出，粮食品种、区域等结构性矛盾突出，成本刚性上升与增加种粮收益的矛盾突出，个别品种外采率高与国际贸易风险的矛盾突出。要久久为功，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。

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，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，

紧扣保障粮食安全要害，加大粮食产量、播种面积、耕地保护和保供稳价等考核权重，强化考核结果运用，充分发挥导向作用。扎实开展中央储备粮棉管理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情况考核，压实各方责任。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深入推进粮食储备安全管理体系机制改革。开展专项整治，从严惩治涉粮腐败，深化粮食储备购销领域监管体制机制改革。加快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进程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。认真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，继续加大支持力度，使务农种粮有效益、不吃亏、得实惠。

切实加大耕地保护和农田建设力度。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，划足划好永久基本农田并确保主要用于种粮。实施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，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，全面提升耕地地力等级。加快发展高效节水灌溉，在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地区建设改造一批大中型灌区，提高稳产增产能力。推进耕地宜机化改造，解决耕地碎片化问题。深入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，挖掘潜力新增耕地，支持将符合条件的盐碱地等后备资源适度有序开发为耕地。

强化现代种业等科技支撑。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，“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，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，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、种源自主可控”。支持现代种业提升工程，把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抓紧抓实，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，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。加快农机农艺、良种良法等科技突破，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和集成示

范。始终立足抗灾夺丰收，健全农作物病虫害等防治体系，全面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。

优化农业布局和产品结构。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口粮等必备品种，稳口粮、稳玉米、扩大豆、扩油料，着力提高单产。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，在黄淮海、西北和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，在东北地区开展粮豆轮作，充分挖掘大豆增产空间和潜力，开展盐碱地大豆种植示范。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。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，推动用地与养地相结合，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。贯彻大食物观，宜粮则粮、宜经则经、宜牧则牧，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、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。

提升粮食收储调控能力。认真组织粮食收购，守住“种粮卖得出”底线；多措并举组织好市场化收购，推动形成主体多元、渠道多样、优粮优价的市场化收购新格局。强化储备调节。优化政府粮食储备规模结构布局，完善储备调控体系，增强政府调控能力。合理把握政策性粮食销售节奏和力度，增加市场有效供应。加强市场预期引导，维护正常市场秩序。落实全球发展倡议。以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，积极支持粮食企业“走出去”“引进来”，开展国际合作，拓展多元化粮食来源市场。推进全产业链节约减损。落实粮食节约行动方案，推进饲料减量替代，倡导节约消费。

(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、局长)